

●思想者营地

两部关于文艺工作的经典文献

若苦

今年,是毛泽东同志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》(以下简称《讲话》)发表80周年。《讲话》是一篇划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,开辟了中国革命文艺史的新纪元。每当我重温《讲话》,感受其无与伦比的理论魅力时,就会情不自禁地联想到,2014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《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》(以下亦简称《讲话》)。前者是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中国化的第一次伟大飞跃,后者则是一次新的伟大飞跃。两篇《讲话》前后相隔72年,时代变迁了,语境演化了,问题更新了。可是,我们不难发现,二者在理论指向、议题论域、阐述逻辑和话语风格上,却又是那么相通和相似。

整顿作风,针对性地解决问题。两篇《讲话》的理论探讨和现象分析,都是从问题出发,把解决各种文艺理论和政策问题放在首位。毛泽东同志的《讲话》,是在总结了过去党内的路线分歧,分析了广泛存在的思想作风问题,开展全党整风运动的大背景下产生的“整风文献”,为当时正面临歧路和迷茫的延安文艺运动,分辨了是非,澄清了疑惑,指明了方向,给出了办法。习近平总书记的《讲话》,是在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,反腐肃纪、扭转党风的大背景和大环境下发

表的,是为调整文艺航向、针对文艺界普遍存在的诸种不良风气和思想倾向而谈的,号召要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原则来加以改进和整顿。这与前者思路吻合,脉络相通,而又守正创新。

文艺要为人民服务,为社会主义服务。毛泽东同志在《讲话》中首次旗帜鲜明地提出:“为什么人的问题,是一个根本的问题,原则的问题”“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,首先是为工农兵的”。习近平总书记《在《讲话》中强调,“社会主义文艺,从本质上讲,就是人民的文艺。文艺要反映好人民心声,就要坚持为人民服务、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个根本方向”。并告诫说:“文艺不能在市场经济大潮中迷失方向,不能在为什么人的问题上发生偏差,否则文艺就没有生命力。”二者都强调文艺工作者必须坚守人民立场,抓住了解决文艺问题的总枢纽。

文艺的创作良方:扎根人民,扎根生活。毛泽东同志根据事先调查的情况和座谈会发言,具体分析和批评了延安文艺界存在的八种观点,开出良方:人民生活是“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”“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、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”。习近平总书记《在《讲话》中,针对作品的数量与质量的失衡、社会

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偏废等问题,指出“文艺不能当市场的奴隶,不要沾满了铜臭气”“人民是文艺创作的源头活水,一旦离开人民,文艺就会变成无根的浮萍、无病的呻吟、无魂的躯壳”。纵使文艺的创作方法有千万条,但“最根本、最关键、最牢靠的办法是扎根人民、扎根生活”。

文艺工作者的历史责任和使命,是为人民提供满意的精神食粮。两次文艺座谈会都坚持百花齐放、百家争鸣的“双百”方针,充分发扬学术民主、艺术民主。把握文艺的时代性、人民性,创作更多更优秀的文艺作品,是文艺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。两篇《讲话》在强调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对创作和批评的指导作用、期待文艺作品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等方面,是一致的。

总之,这些相通和相近,说明两篇《讲话》的思路是衔接赓续的,精神是一脉相承的,理论是与时俱进的。我们务必把两篇《讲话》统一起来、结合起来,弄清二者的思想精髓和内在联系,提高文艺自觉、增强文艺自信,将其精神落实到创作和批评中去,自觉完成从理性认识到文艺实践的飞跃,推动社会主义文艺大发展大繁荣。

(若苦,武冈市退休干部)



雾绕茶园

王松华 摄

●邵阳诗韵

湖湘名宿咏武冈(外一篇)

刘宝田

湛开涟,湖南善化(今长沙)人,乾隆十一年(1746)任武冈学正,后升荆州府教授。其《宣风雪霁》云:“海宇天开雪尽融,坐收爽气到宣风。冰消岩壑青葱出,米貰田家阡陌通。战退霜威梅更老……物华不许重阴闭,人在南城画图中。”此诗扣住“雪霁”,写得漂亮。雪融了,风爽了,冰消了,路通了。貰,租、借之意。去田家貰米,阡陌也通达了。霜雪退了,梅更苍劲;檐前冰凌融滴,初升的太阳鲜亮彤红。一幅雪霁油画,色彩明丽,风骨挺拔。炼句之工,可圈可点。物华重展生机,人亦如在画图之中。

其《法相洞》云:“幽洞何年指划开,蚕丝小径石崖嵬。游人络绎传薪火,深处微茫辨劫灰。一线有天通日月,入门似阵鼓风雷。卧龙去后沧江远,鳞甲纷纷长绿苔。”此诗没有一细写洞府之景,但却让人深感洞之幽深、奇奥。最后回答开头所问,原来这是卧龙之居所,龙归沧江之后,洞即指划而开。那已经很久远了,这些石笋石砢石榻石凳,都是龙蜕化留下的鳞甲,长满了斑驳的青苔。神奇而沧桑,确乎仙境矣。

宣风雪霁也好,法相洞天也好,都胜似蓬莱方壺,所以他在另一首《山行》中说,“长啸鸣山谷,孙登不复逢”,这里就是桃源仙境,再也不要去做孙登那样的隐士了。孙登,博学多才,因长隐河南辉县苏门山,又称苏门先生。

王闿运,湘潭人,号湘绮,咸丰二年

(1852)举人,晚清经学家、文学家。

其《武冈同宝山仙苑寺》云:“芳辰无近寻,林薄愜幽趾。瞻岩契仙栖,转石漱清泚。高梧上离离,轻膝下纚纚。鸟鸣绿阴处,山纳疏窗里……卜居何所美,南谷飞平田。微风山径冥,惟言樵采远。”前面描绘寺况,岩高水清,梧耸鸟鸣。阁出云,窗含山,壁如削,壑清冷。环境幽寂,寺境深邃。后面抒情言志,遥树可结静缘,激流可涤俗怀,赏心而删尘缠;可以选择这个地方幽居,到南边山谷那一片平田耕云播雨,种日收月……入世之人常作出世之想,湘绮先生亦是也。

作客邵阳漫吟诗

王闿运、邓辅纶、邓绎、李篁仙、龙汝霖为晚清“湘中五子”,相互过从甚密。

王闿运至武冈访二邓时,来去吟有一组关于邵阳的诗歌,试摘赏之。《春社日往邵阳道中二首》,其一云:“作客真成计,逢春定别家。故园风过柳,残月夜依花。歧路马犹顾,累波鷗自斜。离心共芳草,著处便天涯。”按照约定的计划,春天的社日去邵阳作客了。社日,祭祀土地神的日子。趁着残月,早早出发;踏上征途,但见杨柳依依。逢到岔路,马有点迟疑、顾盼;惊起了水上的鷗鸟,斜斜飞起。离心像芳草一样铺向了远方,停下的地方就已经是天涯了。此诗写离家的情况与心情。

其二,才是写邵阳道中的风物:“日斜春

冥冥,山路尽遥遥。野鹤争云疾,池鹅得雨骄。旧家看老树,新水漫官桥。何处堪充隐,从君寄一瓢。”鹤在云中争飞回巢,鹅在池中遇雨撒欢。老树滴雨,淅淅沥沥;水淹官桥,弥弥漫漫。哪里可以暂充隐所呢?跟从着你,像颜回一样,陋巷也可以安居呵。“君”,约其来邵做客的友人。

至邵阳后,王闿运有赠二邓诗多首。《邓拔贡辅纶》云:“舍人守真纯,忘机狎世缘。抱璞若谐众,冥思亦孤鸾。宜情泪隐志,保己涵深筌。黉黉达士怀,宦官古智贤。”赞扬邓辅纶品格纯真,没有机心,看轻世俗。狎,玩,轻视。怀抱宝器,又和谐处世;深思智远,又孤自高飞,即高出众人。宜情不顺,深藏大志,坚守本性,又不忘根本。筌,捕鱼器,此指根基。光明磊落的达士胸怀,深邃广阔的贤士智慧,令人敬重。

王闿运《邓文学绎》一诗,称誉邓绎“仲子夙奇服,长啸扬清光”。临别时,王闿运又赋诗《别辛眉》以赠邓绎。辛眉,邓绎之号。诗曰:“并驱出东郊,马樊不宜驰。悲鸣相先后,似欲伤乖离。况我同袍子,念别在须斯。谁言会日近,一息如三时。谁谓归途易,独往情已疲。寸心如明月,已合愿不亏。仆夫务前征,恨怆与子违。望问欣温待,反轡怨孤睽。二念既合并,中路又何依?”

出城不远,王闿运《武冈大甸雨中至水口作寄二邓》云:“春色雨始佳,云山绿相待”“华叶续为芳,光阴散成采”,心情真是好极了。



塘渡口原为武冈辖区,宋元明清时属紫阳乡,民国廿七年改属长乐乡。1951年,析老邵阳县西南一部,合武冈县东部一带新置邵阳县,迁县治至塘渡口,塘渡口由此成为邵阳县县城。

关于塘渡口地名的由来,《邵阳县志(1978—2002)》称:“明季,有唐姓族人捐置田产,在此摆设义渡,故名唐渡口,后讹为塘渡口。”《湖南省行政区划大典》^{阿旧}的说法与此雷同:“相传有唐姓族人捐置田产,在境域摆设义渡,故名唐渡口,后依谐音演变成塘渡口。”那么,这个说法是否符合事实呢?

据塘渡口《唐氏族谱》,其先祖最先卜居于菜花墟,即塘渡口镇南五千米左右的唐家湾附近。这一带有向阳村、石桥村和羊田村,清时属武冈州屯田村。光绪《武冈州志》载此地有“故元屯田”,水利优越,田地肥沃。元代屯田多是军屯,大德年间(1297—1307)已渐废弛,塘渡口唐氏先祖徙居于此的时间正是在元屯田制废弛之后。《湖南氏族源流》载,塘渡口唐氏鼻祖为长乐公,于元泰定年间(1324—1328)“卜居武攸紫阳乡菜花墟”。唐氏以此为中心,发枝散叶,“散居者三十余里”。

塘渡口古渡口曾立有《唐渡口记》碑,记有唐氏升公和六公在此捐资摆设义渡事迹,而这也应当做塘渡口本为“唐渡口”的一个重要证据。升公、六公兄弟分别是塘渡口唐氏升房和六房的始祖。唐氏族谱载《唐渡口记》和《唐氏源流第宅赋》,同撰于光绪庚子岁(1900),作者唐永亮自称为升房十七世孙,由此可推知,升公、六公生活年代或在公元17世纪左右,即县志所谓“明季”。

清康熙《武冈州志》记载“(塘头湾市)在城东一百八十里”。“塘头湾市”即塘渡口,当是目前已知对塘渡口地名的最早记载。康熙《宝庆府志》记载与此相同。塘头湾市,为“塘”,而非“唐”。

对塘渡口的地名来历,1982年版的《湖南省邵阳县地名录》给出了另一种说法:“塘渡口昔为武冈县边缘山村小集市,夫夷水至此,石壁阻挡,形成河湾似塘,历有渡口,故名。”夫夷江经塘渡口镇段形成两个回湾,南边的叫泥湾,在塘万保村;北边的叫石湾,即塘渡口古渡口一带。说塘渡口之“塘”是因河湾似塘而得名,正符合实情。而这个说法也正与康熙《宝庆府志》和《武冈州志》记载塘渡口的原名为“塘头湾”相合。

在乾隆、嘉庆版的《武冈州志》里,“塘头湾市”变成了“唐头湾市”,这说明这段时期唐姓人在此地的巨大影响力,这个“塘”开始姓“唐”了。但“塘”后才有“唐”,先后关系明了;而且“唐头”后面有“湾”字,显然,“唐”源自于“塘”。这时候的地名仍称湾,而非渡。

之后的道光《宝庆府志》称塘渡口为塘路口,而非唐渡口或唐路口。今邵阳县西北一带的金称市、长乐、蔡桥等地人,还称塘渡口为塘路口。

塘渡口,1931年出版的《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》载为“塘渡口市”,1933年傅角今编著的《湖南地理志》载为“唐渡市”,1938武汉亚新学社出版的《湖南省地图》上标为“塘渡口”,《申报》1939年出版的《中国分省地图》,仍标注为“塘渡口”。

从以上地名流变来看,关于塘渡口的地名来历,1982年版的《湖南省邵阳县地名录》的说法显然更符合实情。当然,唐氏作为当地望族,在塘渡口的地名流变中曾产生过显著影响,这是毫无疑问的,但并非地名由来之源头。而以姓氏为地名,通常姓后有“家”字,如邵东范家山、洞口李家渡等;有的因简化等原因而无“家”字,如黄亭市镇和蔡桥乡,但前者方志记载为“王家亭”,后者本地仍俗称为“蔡家桥”。而塘渡口,无论是官方记载还是民间俗称,之前皆从未有过“唐家渡(口)”之名。因此,单就这一点来看,塘渡口的“塘”之源头当亦非姓氏之“唐”。

综上所述,今名塘渡口并非讹误,而正是回归其本原;今县志等称“塘”为“唐”之讹或谐音演变,其实是不知其源流而本末倒置了。

(阿旧,新宁人,学者)

●史海钩沉

塘渡口地名由来考